

天一閣藏書和書目

駱兆平

天一閣是我國現存歷史最久的藏書樓。它創建於明朝嘉靖四十年間（1561年），距今已有四百多年了。四百年前，寧波已經是浙東的文化中心，私人藏書之風盛行。宋朝時有樓氏東樓，史氏碧沚，趙氏資重樓，王氏汲古堂；元朝時有袁氏清客居。到明朝，范欽承其流風，從當地藏書家豐道生、王弇州等處購鈔書籍，建立藏書樓，當初叫東明草堂，後來在湖西造起了天一閣。

范欽字堯卿，號東明，浙江鄞縣人。嘉靖十一年（1532年）進士，官至兵部右侍郎。先後到過江西、廣西、福建、雲南、陝西、河南諸省。因此有機會從各地購鈔了許多善本書籍。閣內原藏書籍達七萬多卷，都是宋、元、明的刻抄本。其中很多書籍是國內孤本，極為珍貴。例如：宋建陽刻本《十七史百將傳》，元李氏建安書堂活字本《元詩前後集》，明弘治八年銅活字本《會通館印緝補古今合璧事類》，明刻李鳳纂修《正德雲南志》，明刻唐錦纂修《弘治上海志》，明刻管律纂修《嘉靖重修寧夏新志》等，都為國內所罕見。閣內明鈔本，多用藍絲綢、朱絲蘭和烏絲蘭綿紙，字體挺秀，令人愛不釋手。

天一閣的藏書特點是，收藏了很多明朝一代的方志、登科錄和政書。這對我們今天研究明朝歷史都是些極寶貴的資料。特別是四川、雲南、陝西沿邊各省、縣的志書，更是研究我國各兄弟民族歷史的難得資料。此外，還有許多研究祖國醫學、文學、地理等大有用處的資料，以及不少“可與史傳正其闕繆”的金石碑帖等。

但是，由於過去反動統治階級的不重視文物保護，歷年來，天一閣藏書的大量散失，就有五次，其數量是十分驚人的。

（一）1644年至1662年前後，明清易代，散失藏書達20%左右。明歷朝實錄半數以上遭到遺失。

（二）1773年，清乾隆帝開四庫全書館，要各地進呈善本圖書。當時天一閣進呈的有641部。後來乾隆帝送給天一閣《圖書集成》一萬卷。但是這許多進呈的圖書，都被承辦者扣留，沒有退還。

（三）1840年（道光二十年）鴉片戰爭時，英帝國主義者佔據了寧波，闖進天一閣，掠取《一統志》和其他地理書籍數十種之多。

（四）1861年（咸豐十一年），太平天國軍隊進駐寧波前後，當地小偷乘混亂之際，拆毀閣後牆垣，潛運藏書，論斤賤賣給奉化唐嶼造紙商人，不少珍貴書籍，當作了造還魂紙的原料。

（五）1914年，資本主義各國收買文物的商人，勾結上海舊書商，雇用大盜薛繼渭，挖樓潛入閣內，依照書商指定的書目，竊去藏書一千多種。後來商務印書館搜集了四、五百種，放在涵芬樓，抗日戰爭時，不幸又遭日機轰炸。

經過上述五次的劫掠，天一閣原藏七萬多卷書籍，只剩下了一萬多卷。

解放前，當地群眾稱天一閣為“天一角”，除了個別士大夫外，一般專家、學者及其它讀者，要想看到天一閣藏書，根本是不可能的。已故文化部副部長鄭振鐸先生，在《錄鬼簿》一書題跋中說：“十七、八年前，趙斐雲先生自北平南下訪書，時馬隅卿先生方歸四明讀書。我輩偶發豪興，欲至甬訪之，借以登天一閣觀未見書。海上台風迺大作，未能成行。便先至杭州，轉紹興，至寧波。中途趕車，獨雇大汽車一，飛馳而去，西湖鑑湖之勝，皆不暇攬之矣。……偶卿日奔走謀一登天一閣，而終格於范氏族規，不得遂所願。蓋范氏嘗相約，非曝書日即子孫亦不得登閣也。”寧波有一位張涯莊先生曾寫過一首打油詩：“湖西一塊地，地上一只閣，閣中何所有？藏書被賊偷”。後來，由於書籍沒有很好保護，虫蝕現象極為嚴重。張先生又寫道：“湖西一塊地，地上一只閣，閣中何所有？藏書被虫吃”。那時牆垣倒塌，滿庭荒草，景象十分淒涼。

解放后，祖国的文化遗产得到了重视，党和政府对天一阁采取了“重点保护”和“古为今用”的方针。先后拨出巨款修理天一阁，并陆续收回散失在民间的天一阁旧藏图书164册，又设置修书员，专门进行藏书的修补、整理工作，图书的虫蚀现象从此杜绝，使天一阁面貌焕然一新。现在全国各地科学和历史研究机关纷纷委抄资料。1958年，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还特地派人到天一阁拍摄珍贵藏书一百多种。专家、学者和广大读者，只要凭工作单位证件，都可进阁阅览“海内孤本”。最近，宁波市文管会和上海古籍书店合作，计划出版一套《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》，其中《嘉靖瑞金县志》等十余种已经印行。计划今年再影印一百五十种，明年全部印完，让这些许多珍贵资料 and 更广大的读者见面。解放后，那位张涯庄先生又写了一首诗：“湖西一块地，地上一只阁，阁中何所有？藏书被人读”的确，我们看到了过去被人蹂躏摧残的天一阁，今天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恢复了青春，得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，怎能不令人为之欢欣鼓舞呢！

二

为了进一步查清散失在外面的天一阁原藏书籍的情况，以便尽可能通过适当方式加以收回，保持原有藏书的系统性和完整性，使它更好地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，因此有必要编制一部《天一阁书目外编》。《外编》的编辑，是一项艰巨复杂的工作。解放前曾经有人提出这样的计划，终因规模较大，条件不够，未能实现。今天我们在党和政府的关怀领导下，又承当地冯孟颢等老先生的指导协助，经过半年多时间，已经完成《外编》初稿的编辑工作。《外编》著录的书籍，加上现有藏书数，约占范钦原藏书籍的90%以上，这样，基本上已经查清了天一阁原藏书籍的具体情况。

天一阁最早的藏书目录，是范钦自己编制的《范氏东明书目》一册（见朱睦㮮《万卷堂书目》）和《四明范氏书目》二卷（见焦竑《国史经籍志》）。范钦死后，又有人编过《四明范氏天一阁藏书目》四卷，二册（见祁承㮟《淡生堂藏书目》和黄虞稷《千顷堂书目》），《范氏天一阁书目》（见黄宗羲《南雷文案》），《天一阁书目》（见沈叔埏《颐綵堂文集》），《司马氏书目二本钞》（见《四明天一阁书目》）。但是，这些目录至今都已失传，清朝以前天一阁藏书情况无从查考。

现存最旧的天一阁书目是罗振玉刻玉简斋丛书本《四明天一阁藏书目录》二册，不著撰人名氏，卷末记有“嘉庆壬戌六月二十日客寓金闾录”字样（以下简称《壬戌目》）。因书目中已载有《图书集成》，可知这部目录是乾隆39年赐书后编成的。目录按分厨编排，只记书名、册数，不记作者、卷数、版本等，而且医书、登科录、释道家等类书籍，多不编入，所以不能完整地反映天一阁当时的藏书情况。

嘉庆八、九年间（1803年）浙江巡抚阮元命范氏后人登阁编目。嘉庆十三年刊印《天一阁书目》十卷，补遗一卷，范氏著作一卷（以下简称《阮目》）。体例仿清《四库书目》，分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。撰书人名氏、卷数、写刻版本、序跋等著录，较为详细。《壬戌目》所不载的医书、登科录等，此目都有著录。但编目的时候，正当乾隆禁书之后，如王世贞《纲鉴会纂》、钱肃乐《庚辰春偶吟》等属禁书范围的，都不曾编入。此外，在编排著录方面，也有不适当的地方。

道光二十七年（1847年），天一阁藏书遭到英帝国主义掠夺以后，当时的浙江布政司刘喜海来天一阁看书，随手抄录，编成《天一阁见存书目》十二卷（以下简称《刘目》），依照《阮目》分类次序排列。但增出《阮目》所不载的书籍共四百六十三种。

太平天国军队进驻宁波前后，当地小偷窃去天一阁藏书之后，至光绪十年间（1884年），浙江宁绍台兼管水利海防兵备道薛福成，命钱学嘉等三人，重编《天一阁见存书目》，共四卷，首末二卷（以下简称《薛目》），亦照《四库全书》体例编排，对于当时书籍的存佚情况，著录比较详细。尤其是《进呈书目》部分，系根据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和《浙江采集遗书总录》校对增补，认为当时进呈的书籍共有638部，比《阮目》所载602部，多出36部，而且在著录上也胜过《阮目》。但是清乾隆以后范氏后人所收集的图书，在目录中没有载入。“科举拈括，家传行状，唱和劝善诸刻”和“虫残水渍，不复成书”的，也都被棄置未编。

1914年以后，又有人为天一阁编过几种目录。现存的有三种：一种是1928年林集虚编《目睹天一阁书录》四卷，附编一卷（以下简称《林目》），对于书籍的版本，包括刻抄本、时代、年号、行格、牌子、刻工姓名、装订、补钞、脱叶、书纸种类、藏书印记等，记载十分详细，但书籍的登记多有遗漏。另一种是1936年杨铁夫编《重编宁波范氏天一阁图书

目录》一册（以下简称《楊目》），因为它仅仅是依照书籍的牙籤抄录，所以分类杂乱，錯誤百出，除記录书名、册数外，别无著录。还有一种是1940年馮貞群編《鄧范氏天一閣書目內編》（简称《內編》），記录了当时天一閣的全部藏书，在分类和著录方面也吸收了以上各书目的优点。但是《內編》所录的藏书，有一些在解放前已經遺失；《內編》所不录的藏书，解放后又給續收回。因此目前作为天一閣現存藏书目录的《內編》，也还需要經過一番修訂。

《天一閣書目外編》，就是以上面所說七种目录为基础，校对补充，輯录而成。在編輯过程中，还参考了《北京圖書館善本书目》、《涵芬樓藏书目》、《明清貢举考略》、《四庫全书总目》、《中国人名大辞典》、《千頃堂书目》等等资料，校正現存各种天一閣书目中的錯誤。又根据賬簿《康熙中傳抄天一閣書目》增

补了21部，根据《通志堂經解》、《經义考》等增补了七种。对各书目所載異同，則以《阮目》为主体，一一加以詳細注釋。

《进呈书目》在《外編》中列为单独一部分。經過《阮目》、《薛目》、《四庫全书总目》、《浙江采集遺书总录》相互之間的校勘，发现当时进呈的书籍共为641部，糾正了《阮目》和《薛目》的錯誤。

但是，由于現存七种目录中，除了被清朝統治階級明文規定为禁书的沒有記載外，又被当时的編目者随意刪棄了一部分，因此这些目录都不能完整地反映出天一閣过去的藏书情况。更由于明朝以前天一閣书目的失傳，資料不足，查对为难，因此《外編》也就不可能完全反映目前天一閣散失在外的图书情况。对于《外編》存在的这一缺陷，只有留待旧目考查工作进一步开展以后，再来逐步弥补了。

浙东著名藏书家馮孟頤家屬將“伏 附室”十万卷藏书獻給国家

今年四月，浙东著名藏书家伏附室主人馮孟頤先生，不幸因病逝世，其家屬遵照先生遺囑已將伏附室全部藏书二百六十多箱，近十万卷，捐獻給国家。

宁波市人民委员会为了嘉奖馮氏家屬，特发給奖状一張，奖金一万元，并决定藏书室地址不变，仍保持“伏附室”原名，另設陈列室，于室内悬挂孟頤先生遺像，以志紀念，并由宁波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負責整理开放。馮氏家屬看到党和政府对祖国文化遗产如此重視，深为感动，願將政府給予的全部奖金轉贈伏附室，用作該室图书保护和出版的經費。

孟頤先生一生經歷了三个不同的时代。他是清末的秀才。在民国时代由于不滿反动政府的黑暗統治，便閉門讀書，故自号“伏附居士”。解放后，他才积极参加社会活动，曾任浙江省文史館館員、宁波市政协委员、宁波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員，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設事业做了不少工作。

孟頤先生是一位对祖国文化遗产很有研究的学者，擅长校勘，喜作考据，具有丰富的版本和目录学知識。著有《鄧范氏天一閣書目內

篇》十卷、《續汇刻帖目》四卷、《鄧城古 覽 录》一卷、《簡化字溯源表》一卷、《錢肅乐年譜》一卷、《續編、附录》二卷等十余种。他酷愛書笈，經常从书店书摊中一本本、一頁頁地搜尋积累，經過修補綴輯，便成为一部又一部内容完整的书笈，或作批注，或写題跋，长年累月，以此为乐，即使在战乱的岁月，也从不间断，遺下的十万卷书笈，便是他四十多年来辛勤搜集的結果。

伏附室藏书内容，非常丰富，其中以史部和集部为最多，其次是經部、子部和丛书。此外还有不少碑帖和字画。这些都是研究我国古代历史和学术的宝贵資料。单說目录类所收的二百多种书目著作，便是研究我国古代目录学的难得資料。还有数百种地方文献，更是研究各地方政治經濟和文化发展的重要材料。

伏附室藏书中有不少珍版善本。如宋刻本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》，元刻本《春秋屬辭》和《乐府詩集》，明刻本《刘随州詩集》等，都是不可多见的书笈。尤其可宝贵的是名人手稿，如全謝山亲笔眉批的《鮑塘亭集》抄稿本，《姚复庄詩文稿》，清史榮以毕生精力所作的《李长吉詩注》稿本等。据初步統計，善本书笈有三百种之多。

最近，宁波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派专人整理該室的藏书，并采取各种防潮防虫措施，加强藏书保护。不久即可对外开放。（駱兆平）